

蒲公英

——纪念父亲靳以 110 周年诞辰

■章洁思

每天上网时,总要浏览一下我钟爱的摄影网站,这已经成了多年的习惯。而一旦看到蒲公英的图片,总有点抵御不住。今天就是这样。虽然照片并不大,不是完全合我的意,但我还是不由自主把它下载了下来。因为,每当看到这样的照片,我的眼前就会浮现 60 年前父亲靳以拿给我看的那张画片:一个小女孩蹲在那里专心地吹蒲公英……画面非常纯净,好似上世纪 50 年代的空气。因为那时《萌芽》杂志即将创刊,父亲有心在寻求封面。虽然父亲并不是该杂志的主编,但他一如既往好似自己的刊物那样挂心。

时光悠悠,不觉父亲已经离世 60 载了。今年也是他 110 周年诞辰。抬头见父亲在墙上的照片,仍旧那么年轻,那么精神,仿佛一响,父亲还会走进门来,伴随着的是一声亲热的“南南!”每天都是如此。但是,我已经 60 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唤声,就像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爱我疼我的人走了。”当时看到这句话时我还没有感觉,而现在,继母亲、哥哥一一离世,我是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整理父亲的书信日记,这些书信和日记,记录了他一生的经历和足迹。拿起最早的一封信,当时他还不满 20 岁,正在大学求学,满纸“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意境。然后,是他走上社会,开始文学生涯。他奔忙、追求,坚持自己的理想,全身心扑在

写作上,他编了很多刊物:《文学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文丛》《文群》副刊、《现代文艺》《中国作家》《小说》月刊、《收获》……还有许多报纸的文艺副刊。他的一生没有虚度,虽然只有 50 年。他从没有吝惜过自己的健康,为文学事业贡献出了自己毕生的力量。

回看父亲在建国十年期间的心路,是从满腔热情充满憧憬,到疑惑,不解,直至身心交瘁。父亲的一位很了解他的好友曾对母亲说:“靳以就是被累死的。”一开始,我并不理解这句话,但我读了父亲的信,读到最后几年,感受到他的不堪重负、无所适从,他的困惑、矛盾、苦闷而又无法对人言说……我才一点点理解了。

父亲解放前为了逃避国民党检查官的检查而变换了笔名,写作了《人世百图》,其中一篇《熊的故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因为里面的这一段话:“在黑龙江北部一座森林里,盘踞了一族熊群。它们沿用它们祖先的方法,来残害人类”而被无端指责为“影射苏联”。而他在沪江大学任教务长期间,那无尽的会议,无尽的思想检查,都如实地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中得到留存。我把这个小小的本子搁在手



靳以

心,感到它是那么沉重,以致不忍卒读。到了 1956 年,中国作协委托他创办大型刊物《收获》,一直对办刊情有独钟的父亲,那时是多么欢天喜地啊!冰心先生在悼念父亲的文章中有一段形象的描述:“一个冬天的早晨,一辆汽车飞也似地开到我的门口,你,一阵旋风似地卷上了楼,身上穿着一件簇新的皮大衣。我笑说:‘好呀,这皮大衣给我带来了一屋子的热气!’你也笑了说:‘我要到苏联去了,这是行装的一部

分——告诉你,我们要办一个新文学刊物了,名字就叫《收获》,你对这个名字有意见没有?你可要在这刊物写文章呵,我就是为这个来的。’”父亲不辞辛劳,四处奔走,给《收获》组稿。他在信中对巴金说:“我一定要有三期稿子的把握。”是啊,他确实组了许多稿,冰心、郑振铎、老舍、艾芜、沈从文、曹禺……活页纸上的那一行行字跳跃着,注满他的激情。当时在北京为《收获》工作的函子阿姨对我回忆起那段时光,也禁不住露出兴奋的神情。父亲甚至还出版《收获丛书》、创办出版社……他在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正计划把家壁拉过来,将来搞一个‘上海作家出版社’,专出创作。独立经营,不受上海作协和北京作家出版社领导,由上海宣传部领导。三个刊物都由这里出,家壁的丛书(约有四套)以外,‘收获丛书’、《文艺月报》也可以理论小品为主出一个丛书,《萌芽》也可以来一个丛书。”

这些热情的打算无疑被浇了

冷水,《收获》才维持了五个月,父亲就被要求“离开杂志到工厂深入生活”。为了延续《收获》的生命,他无奈开始半天工厂、半天编辑部的日程,晚上,还要去访问工人家庭,或是在家看稿写作,当然,不乏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干扰。

我的二叔,父亲最亲近的二弟,1957 年被发配到大山中做苦力,而在这之前十年,父亲从孤岛上海辛苦跋涉来到重庆,曾借住在二叔家中,那时,他们兄弟天天夜里抵足长谈,有说不完的话,兄弟情深啊!父亲怎么会理解二叔的厄运呢,他给我的堂哥每月寄读大学的生活费,给我的堂妹寄棉衣物,一边口中喃喃地说:“孩子有什么错?”

繁忙的工作,心绪的恶劣,导致父亲健康的迅速下降。在去世前一年,他就被美尼尔症困扰,他曾对我说,他的两脚就像踩在棉花上那样。第二年,他连续心力衰竭了两次,而第三次,就没能走出医院。

这就是父亲简略的心路历程。父亲的好友陈同生伯伯曾在第一眼见到父亲时,就为他冠以“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之名,如今想来,真是确切。

回看这张蒲公英画片,小女孩的眼神是如此纯净,很像如一介书生的父亲自己,他也是这样走进世界、希望世界的。回想我和哥哥的名字,都嵌着“纯洁”二字,这也是父亲对世界的追求罢!

蒲公英的种子会撒满大地,小女孩的纯情又会怎样呢?

毛边举隅

赠钱锺书夫妇的毛边本《手掌集》

■陈子善

《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王圣思著,2003 年 8 月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版)中,有一段关于《手掌集》的有趣的文坛掌故:

施蛰存回忆起,一次在辛笛家吃饭,告辞时辛笛送大家一本新出的诗集《手掌集》。出得门来,友人中的一位指着封面开玩笑地说,辛笛的这只手拿花,另一只手则握着钱(是指他在银行工作有较丰厚的收入)。

“开玩笑”的这位“友人”是谁?谜底不到两个月就揭晓了。为庆贺施蛰存百岁生日,我写了《施蛰存先生侧记》(2003 年 10 月 18 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文中引用我 1999 年 11 月 24 日拜访施蛰存当天日记所记他说的一段话:

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锺书、施蛰存和另一位作家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锺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表述虽稍有不同,指的显然是同一件事。由此可以确定,这一位“友人”正是钱锺书,“花”“钱”对比完全符合钱锺书喜欢嘲讽友人的性格。

《手掌集》是辛笛的第二本新诗集,1948 年 1 月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初版。此书封面选用了英国版画家裘屈罗·赫米斯(Gertrude Hermes)的作品《花》(Flowers)。

《花》最初入选萧乾编的《英国版画集》(1947 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版),辛笛见到后很欣赏,因为此画为一只向下伸展的丰厚的手掌中央有一朵带叶的紫罗兰,另有两朵紫罗兰散落在指尖之下,整个画面高雅灵动。而这正与《手掌集》书名相配,更与集中《手掌》一诗所形容的“灵巧的”“触须似的手指”相似,遂请主持星群出版公司的装帧设计家曹辛之借用此画作《手掌集》封面图。原作为黑白木刻,曹辛之又为之配色,分为淡蓝色手掌封面的道林纸毛边本和嫩绿色手掌封面的西报纸光边本两种。这就是“友人”钱锺书所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的由来。

有趣的是,当时喜爱赫米斯这朵《花》(或改名《手掌》也未尝不可)的人还不少。在《手掌集》借用作封面装帧五个月后,翻译家韩侍桁所译丹麦文学史大家勃兰兑斯的《拜伦评传》1948 年 6 月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初版,也借用作为此书前后环衬,而且还有所“创新”,把向下伸展的手掌颠倒过来,改为向上伸展,原来散落在指掌下的两朵紫罗兰,也一变而为在指尖之上怒放,艺术效果果然又不一样。《拜伦评传》的装帧设计者是莫志恒,也很有名。

然而,谁能想到,辛笛当年赠送钱锺书夫妇,引起钱锺书大发议论的这本别有意义的《手掌集》,竟然还存在天壤之间,竟然又为我所得,世事竟如此意外而奇妙。这是一本淡蓝色手掌封面道林纸毛边本,前环衬有辛笛钢笔题字:

默存 杨绛 两兄存念

辛笛

一九四八年一月

虽然字迹已有些许漫漶,但仍清晰可辨。此书为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梦熊旧藏,目录页铃有他的“熊融藏书”阳文章。更重要的是,此书是钱锺书对辛笛开这样一个有点刻薄的玩笑的最直接的证据,实在难得。

《手掌集》的文学史价值已不必我再饶舌,但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诗创造》1948 年 1、2、3 月第七、八、九三期接连刊出《手掌集》出版广告,应出自曹辛之之手。其中第七期封三的广告内容最全,尚未引人注意,不妨录一段如下:

作者从事新诗创作已有十余年,凭着他对人生体味的深切入微,凭着他的深厚的修养和熟练的表现手法,使他的诗有一个独特的风格,无论是听他的一个短叹,一声微笑,甚或是一点怅惘与希望,都觉得亲切动人,像从自己发出的一样。他的诗里没有浮面的东西,没有不耐咀嚼的糟粕,他把感觉的真与艺术的真统一成一个至高至纯的境界,使人沉湎其中,低迴忘返。他那柔和清新的笔触,对于造字使字和内在的节奏都是十分完美的……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灵魂的颤巍与演变,面对着这在激荡中的时代,作者敏锐地感觉到自己——也是一般知识分子——的脆弱,因此在本集第三部分,他的调子顿然坚朗了起来,从



《手掌集》毛边本封面、扉页题签。

《手掌》一诗来看,作者是秉有无畏的精神在走向前进的路。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按《手掌集》版权页所示,淡蓝色手掌封面的道林纸本仅印了 50 册(嫩绿色手掌封面的西报纸本印了 1000 册),应都是毛边本,供作者赠送友人之用。《手掌集》问世是 1948 年,毛边本全盛期早已过去,但诗人喜爱毛边本,才有此举。而今,除了题赠钱锺书夫妇的这本《手掌集》之外,那 50 册道林纸毛边本中,还有几本留存于世?